

Globethics Repository



聖經文學在現代中國的意義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uo, Xinpi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13 20:01:4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19

圣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

卓新平

内容提要:圣经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末“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有其参与和贡献。圣经文学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及其文化发展高潮时的这种积极亮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询问。为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圣经文学在20世纪来临和终结这两大关键时期在中国的存在、影响及其思想文化意义,分析其在中国文学发展高潮时的作用和定位。通过中国圣经文学的发展及影响,我们也可找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关联。

关键词:圣经文学;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时期文学

The Significanc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uo Xinping

Abstract: Biblical literature has very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it has its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al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New Period”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uch active appearanc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at the high tid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ttracts of course the attention and the inquiry of the populace. So, it'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xistence, influenc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se two crucial periods of China by the coming and end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o analyze further its function and position at the high ti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we can also find the rel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Biblical literature; New Cultural Movement;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New Period

在当代中国,汉译圣经的印刷已超过七千万册,并且发行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源自中国的圣经版本的世界性流动,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向中国偷运圣经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比令人感叹、发人深省。与之相关联,“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欧美等地成功举办,引起了多次轰动。这也把人们探究圣经的眼光引向了国内。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命运究竟如何?中国人究竟怎样看圣经、用圣经?这都成为人们颇为好奇的问题。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只是将圣经视为基督教经典及其教义基础,而更多地将其作为世界文化经典及文学名著来欣赏、体悟。这样,我们就触及圣经文学在中国的独特意义。从当前中国社会氛围和大多数人们的选择态度来看,可以说,鉴赏圣经文学在中国的圣经

理解中占有最大的影响面,也反映出人们对圣经最感兴趣、最愿意阅读的求知意向。以此为基础,对圣经的理解在深化,对圣经的应用在扩大。而圣经文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则直接推动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为此,本文尝试对圣经文学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之关系加以初步探讨和评说。

一、圣经文学与“新文化运动”

如果说,佛经的汉语翻译和佛教文学在中国的流传曾推动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盛世的形成,在中国古典语言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圣经的白话文翻译及《和合本》等汉译圣经自20世纪以来在中国大众中的流行,则直接参与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带来的变革。这一运动开一代新风,体现出思想的先锋性、文化的大众性和语言表述的通俗性,在多层面上都给人新颖、创造之感。“新文化运动”在破旧立新上突出展示了其对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和扬弃,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引进和吸纳。而在这两个方面,也都有圣经文学在该文化领域的参与和显现。

在20世纪拉开序幕的前后时光中,中国语言文化完成了其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语言表述上即突破了传统的文言文,以白话文这一创新方式而促成了其民众文化的发展。圣经的白话文翻译在这一文化运动中则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着广远的社会影响。圣经的白话文翻译,亦有力推动了圣经文学在中国从古典性到大众性的转型,白话文圣经作为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学范本成为民众乐于接受的精神食粮和文化享受之一,得到普遍流传。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圣经文学成为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得以互通的桥梁,反映了其古

典表述到现代表述的过渡,而圣经文学的相关作品亦脍炙人口,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新思想、新风尚、新的文学表述之诗歌、散文、小说、故事等创作中,圣经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普及扩展的重要作用。

除了以圣经为文本的圣经文学创作之外,“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也明显增加了圣经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内容。如果说圣经文学直接体现在圣经经文、诗歌的翻译和耶稣生平的描述、其传记文学的重构之上,如许地山、李荣芳、赵紫宸、吴经熊、朱维之等人的译作和创作;那么,这种圣经文学也间接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醒目的印痕,如茅盾的小说、冰心的散文、艾青的诗歌等,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圣经题材的运用和圣经意蕴的表露。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曾非常喜欢阅读艾青的诗歌,其感受正如许正林所言,“无论在艾青的诗中还是在他的人格中,都能看到圣经——基督教的深刻影响。”^①对圣经文学的积极结合,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包容和吸纳姿态,同时也为之注入了一种精神意趣、灵性感染力。这一时期的不少中国青年作家往往是通过圣经题材的创作而走入文学、初展才华的。

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因其“世俗化”定位及其社会政治意向而有着对中外宗教的批判和排拒态度,曾导致了从“反孔”到“非耶”、从抵制基督教到全盘否定宗教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倾向。这在其后的“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中得到了典型体现。从表层来看,“新文化运动”在“工具理性”意义上接受、采纳了圣经白话文翻译等所促进的现代通俗语言表达形式,将这种全新的语言文学表述作为其“载道”的“工具”,但在深层次的“价值理性”上,“新文化运动”则以其政治意念来反对宗教意向,以其“世俗”定位而与“宗教”追求分道扬镳。“这场运动的人文主义内

①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第148页。

涵使之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一样,在本质上是一场世俗化的运动。它宣传科学,当然不可能承认宗教的创世之说。它主张民主,当然不可能将从基督教教义衍生出来的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视为天经地义;它否定中国自己的‘孔教’,当然没有理由把19世纪以来经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严厉批判已经开始失去灵光的基督教看做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国内,集中在清除传统文化的‘罪孽’和为建筑近代文明所做的各种努力之上,但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本质必然会启迪近代趋新国人对基督教‘神’文化做一番较深层次的思考认识,这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逻辑。”^①其核心理念“科学”、“民主”、“救亡”、“启蒙”的基本政治定位,使这一运动因更多关注“救亡”而走向“政治运动”,而在“文化创新”上开花虽多、结果却少。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现代百年发展的“世俗”性特色和对“宗教”的淡化,其在取得巨大政治成功和进展的同时,亦为我们在对待自我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因素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反省和沉思之处。由于“非基”和“非宗”运动带来的世俗化倾向和对这一倾向的反对,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走向社会政治或回归内在自我的分化嬗变,同样亦增加了其现代发展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文学”的主流和“灵修文学”的暗涌;二者虽少有交织却各有其影响,而圣经文学在其灵修文学、宗教文学的发展中仍保持住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关地位,在其长达几十年的生存中并没有任凭岁月蹉跎而一无作为。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非基”批判引发了中国教会内部的文化反思和“本土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化”的圣经文学发展。对此朱维之先生在其《基督教与文学》^②一书中有系统描写和精彩阐述。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政治的跌宕起伏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更

①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第42页。

② 参见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

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交流,从对社会政治性的犀利观察追溯到对人性人格的深刻考量。这样,也有不少人像那一时期的作家周作人一样“虽不是基督徒,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对这一运动本身的再反思,应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坛中也活跃着受基督教文学熏染的庞大作家群体,如鲁迅、茅盾、周作人、闻一多、胡适、林语堂、冰心、苏雪林、许地山、庐隐、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老舍、曹禺、巴金、萧乾、徐訏、徐志摩、陈梦家、艾青等人,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以圣经文学及其引申来体现。对于这些作家的心路历程及其作品的灵性探究,杨剑龙在其著作《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②中有着生动勾勒。

圣经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其语言革新和文学创新而有着积极的参与和独到的贡献。圣经文学给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至少吹入了两股清风:一是对圣经内蕴的希伯来精神加以了“中国化”的解读和诠释,并以圣经文学的鲜活形象使国人耳濡目染、耳熟能详,从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内容和精神蕴涵。鲁迅就曾在其《摩罗诗力说》对这一传统积极评价道:“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二是对圣经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扩大了人们认识中国文学背景的视域,由此使圣经文学得以与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积极挂钩,从而增强了宗教文学的文化活力和社会适应性,并给中国现代社会提供了社会观察及批判的新视域、新境界,不少作品以其警醒、遐思、洞见而拉近了圣经文学与中国社会生活需求之间的距离,圣经所表达的愤世嫉俗演变成中国社会中的“呐喊”,由此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性、开放性和理想追求。而在“新文化

① 参见《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371-374页。

② 参见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运动”的“非基”批判风潮中,中国的圣经文学亦步入其自我反思、社会适应的“中国化”发展历程。显而易见,虽然“新文化运动”有拒斥基督教的意向和表态,当时的中国圣经文学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参与了这一运动,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圣经文学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自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其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种“繁荣”以文学的多元化、多流派为特色,有着“百花齐放”之盛景。而在这种“百花”争艳中,在中国大陆曾经久违的圣经文学亦悄然回返,并且迎来了其繁花似锦、春光无限的极佳发展时期。

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期,文学作品的主旨多体现为对“文革”往事的回忆和反思,由此一度风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以非常尖锐、生动感人、而且相对直观的文学语言来述说中国过去十年究竟“怎样了”、并追问这是“为什么”!在抚慰心灵的伤痛和触及灵魂的思索中,体现基督教思想意趣的“救赎文学”与“忏悔文学”得以登场亮相,从而使新时期初期的中国文学与久违的宗教精神相互关联,曾被视为禁忌的宗教灵性终于有了“在位”的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顽强地亮出其身姿。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曾把中国引向了社会“救亡”之途,而在其下半叶最后二十多年的新时期文学之崛起中,却有着人们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劫难”之后对精神“救赎”的找寻,这种情感颇为强烈,而且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其实,这一期间“救赎文学”和“忏悔文学”的风行,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中也有着基督教意识的隐现。在中国社会开始重新调整其对宗教的认知时,文学实际上走在了前列,其中圣经文学就有很大的比重。这种文学感悟和感慨反映出其文学构思之深沉和深刻,也揭示出人们曾深

藏心底的宗教意识和情感。而这种被大众所认可的“救赎文学”和“忏悔文学”实际上叩开了当代中国“灵修文学”之门。以这些文学思潮为基础,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遂雏形初具。

在中国大陆,当代基督教文学的创作和推广实际上乃由“基督徒作家”和“非基督徒作家”所共同完成,其作家身份则可分为职业作家、非职业作家和网络作家这三类。^①他们形成了庞大的作家群体,包括程乃珊、北村、舒婷、丹羽、鲁西西、沙光、于贞志、杜商、庞清明、黄礼孩、谭延桐、老酷、江登兴、傅翔、朱必圣、萧潇、施玮、宁子、汪维藩、齐宏伟、吴尔芬、林鹿、空夏、那岛、范学德、叶子、天婴、姚张心洁、樊松坪、史铁生、海子、苇岸、海啸等人,并有一批以网名活跃在网络上的新派作者。^②其创作的作品在中国社会基层、民间有着广泛的流传,形成人们关注圣经文学的巨大“气场”。

当然,基督教文学涵盖更广,而圣经文学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但乃其极为重要、且具有核心地位的构成。综合来看,新时期的中国圣经文学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为基于圣经素材和术语的应用及发挥,我们在上述作者及其他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创意和灵感;二为以演绎圣经作为创作方式,以自我心得来重新解读圣经文本,赋予其时代新意;三为圣经精神形象的文学表达,其中创作最多的为耶稣形象,随之亦有圣母形象、圣徒形象等;四为圣经核心主题的扩展描述,如“创世”与“末世”、“犯罪”与“救赎”、“堕落”与“忏悔”、“天国”与“人世”、“被逐”与“复归”等。这样就基本形成了对圣经素材和宗教精神的“汉语书写”和“文学表达”。虽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圣经文学仍处于方兴未艾之状,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对圣经主题的极大关注却有目共睹、不言而喻。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文化

① 参见季旻:《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1页。

② 同上,第21-61页。

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关涉“神圣”与“世俗”对比的理解出现了颇为复杂的嬗变。圣经文学正是以一种宗教文学的方式而把信仰的意义、灵性的感染力这一主题重新带入公共话语之中。过去,人们只是从政治的层面来谈论信仰的力量、宗教的作用,而今天则多以文学的形式来更深刻地思考信仰价值、宗教意义,以及在当代中国社会应如何重新认识、积极对待它们的问题。这里,圣经文学的寓言、典故、比喻、象征已不只是一种基督教信仰的还原,而是有着作者本人的认知态度和精神情感,并且会感染、影响到其读者,产生更大的共鸣。与哲学的深刻相对应,文学对于宗教更为敏感,圣经文学的现代生命力正是其对当代人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呼召。因此,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圣经文学不只是对圣经文本及其文学创作本身的研究叙说,而是有当代中国作家群创新意义上的中国圣经文学实践,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之一和独特影响。

中国圣经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突破禁区重新引进圣经素材,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关注及精神诉求。这样,在当代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圣经题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运用及发挥。以圣经思想的深刻蕴涵和引申意义,中国当代作家表达了其对社会、人生、人际、信仰、真理、良知、生死、责任、使命等具有根本性意义诸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反映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意识、自我良心、自我定位等触及灵魂的内观和反省,并触及和探索了对现代社会怎么看、怎么办、自我怎样与社会发生关系等必须正视的敏感问题。这些作者尝试以圣经的智慧来解疑答难,考虑在一个世俗的现代社会如何洁身自好、从善如流、宠辱不惊、超然恬静,既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信仰追求,又能服务社会、顺应潮流、为大众谋福利、做贡献。这种圣经文学实际上勾勒出有宗教情怀或灵性境界的中国当代文化人的心路历程及思想轨迹,有着鲜活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使现代中国文学展示出其灵性层面新的高度和深度,

呈现了另一种景观和美感。正是圣经文学的这种积极参与,新时期中国文学才得以尽善尽美地表达其丰富和繁盛。

此外,新时期文学中圣经文学的参与及活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放性、开明性。文学的繁荣必须基于其论坛海纳百川之态,这会使中国文学既属于世界文学、又影响世界文学。其实,圣经文学正是中西文化沟通、东方文化扩展最好的桥梁和渠道之一。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共同的圣经语言、符号、象征中找到了对话途径,产生了共识,形成了共鸣。在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风行的今天,通俗文化占有当代文化发展的上风,其大众性、时髦感很容易让文学失去其严肃、真诚和深沉。当社会异化到物欲横流、其媚俗的“粉丝”随波逐流时,人的危机也就发生了。在力挽狂澜的文学努力中,圣经文学以其严肃文学、深沉文学的身份参与了对现代社会救渡的呼吁、呐喊,为迷失或迷惘的人群提供了清醒剂、开出了其预防、弥补的处方。在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当代中国圣经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而且也如当前汉译圣经那样走出了国门、影响到世界。由于中国圣经文学作者在当代海内外文学发展中的参与和创作,其作品及影响正以汉语圣经文学的亮相而在缩小、模糊中国圣经文学与国外圣经文学的区别。这样,圣经文学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在场”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势必也会扩大,增强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性、世界性。可以说,圣经文学正在发展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百花苑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正以积极有为之态随中国当代文学一道走向世界、迎接未来。

作者卓新平,1955年生,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甘肃统战基地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圣经〉鉴赏》、《宗教理解》、《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等。